

中國日報：為香港錯失機遇而憂

蕭平

英文《中國日報》香港版今日發表署名評論文章，現譯載如下：

最新一期《中國評論》刊登劉迺強先生的文章，題為《不能讓「十二五」規劃失諸交臂》，讀畢心生共鳴。掩卷而思，不禁為香港添幾分焦慮。

文章介紹了過往幾年，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為爭取香港納入國家「十二五」規劃所做的努力，描繪了「十二五」與香港的未來。作者指出，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，已經是整個大中華經濟體系的一個部分，「經濟一體」是「鐵一般的事實」，香港應當「看準這不可阻擋的勢頭」，抓住「十二五」規劃的有利商機，分享國家發展的紅利。

令作者憂慮的是，特區政府雖然在香港「十二五」規劃中爭得一席之地，卻沒有系統性措施的跟進，只怕會白白錯過歷史的機遇。

而令我憂慮的是，香港漸漸瀰漫的泛政治化傾向，以及愈演愈烈的激進傾向，牽制着整個社會的注意力，甚至成為社會穩定的不確定因素，縱然「十二五」商機再多，也會無暇顧及而失之交臂。

「十二五」規劃將港澳列專章，從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、支持香港培育新興產業、深化內地與香港經濟合作三個層面，給出了明確路向。不久前，李克強副總理訪港，代表中央政府推出36項經濟挺港與兩地合作的政策措施，把「十二五」規劃提出的目標進一步具體化。

李克強着力支持的金融及服務業兩大領域，既是內地發展的亟需，又是香港的優勢所在。沿着這一路向邁進，香港大有用武之地，不僅在「十二五」而且會在更長的時間裡，保持擴張和增長，極有可能迎來類似當年製造業大舉北上、經濟全面提升的繁榮局面。

這是歷史給予香港的機遇，但願香港不會留下歷史的遺憾。

黃毓民議事堂上公然襲警必須追究

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

黃毓民身為立法會議員竟然在議事堂上公然襲警，完全是視法治如無物，對社會造成極惡劣的影響，如果不予追究，難保本港將變成無法無天的九反之地。社會是時候想想坐視這股歪風蔓延的危害性，認真思考是否還要投票給那些禍害香港的政客，反對派表面不支持、實際縱容暴力行為，也要受到社會各界的批評。

「人民力量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，日前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，突然將一件「六四」T恤擲向警務處處長曾偉雄，曾偉雄立即向事務委員會主席涂謹申抗議，但涂謹申竟然說事發時未有看到事件經過，所以沒有在會議上作出跟進云云。涂謹申身為主席主持會議，竟然說看不到黃毓民的暴行，究竟事發時他是睡着了，還是對這些暴力行為視而不見，姑息養奸，他自己心裡明白。當然，相比起反對派的包庇縱容，黃毓民才是始作俑者。雖然他有立法會議員的免責條款保護，但公然在議事堂上向警務處處長擲物，本身已構成嚴重的襲警罪，他的行為完全是視法治如無物，對社會造成極惡劣的影響，如果不予追究，將來一班「憤青」隨意羞辱警務人員，襲擊警員，本港社會將變成無法無天的九反之地，而黃毓民等激進派將是罪魁禍首。

公然侮辱警隊須依法追究

黃毓民的囂張暴戾行徑立即引發社會的反彈，警方方組織立即予以譴責，並批評黃毓民的「過激」行為是公然在議事堂內侮辱處長及整個警隊，要求黃公開道歉，否則不排除有進一步跟進行動。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指社會不容立法會



黃毓民(中間站者)離開座位掃走林瑞麟等人的名牌，最後成為事務委員會首名被驅離場的議員。

議員在議會內以粗暴行為宣洩。即使大家對事實有不同理解、記憶及觀點，或對警方處理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的保安安排有意見，但社會應以「講事實、講道理」的方式溝通。事實上，曾偉雄到立法會是為了了解港大保安事件上的各種爭議，讓社會了解警方當日的部署及考慮，並非是來成為黃毓民等激進派的「出氣袋」，也沒有義務去忍受其情緒性的指罵。固然社會對於港大保安事件有不同看法，彼此意見可以互相溝通，令將來安排更為妥善。但黃毓民及其一班憤青由曾偉雄到立法會的一刻，就擺出一副狙擊的姿態，並非是要講道理，只是一味人身攻擊，對社會了解事件一點好處也沒有。

官員出席立法會會議，同樣是受到法律的保護，黃毓民將T恤擲向曾偉雄，表面上不算嚴重，但本質上卻與襲警無異，假如他擲的是水杯、紙牌，隨時會對曾偉雄造成傷害，是名副其實的襲警行為，而公然挑釁執法人員之首，也是向警隊的侮辱，社會不能輕視事件的嚴重性。黃毓民、梁國雄等人過去已屢次在議事堂內擲蕉掃棍，多次擊中官員，更曾令一名保安員受傷，但有關人士過去都沒有追究，結果令他們更加有恃無恐；這次更變本加厲，公然襲擊曾偉雄，人證物證俱全，執法部門應該依法追究，不要令黃毓民等以為暴力違法「零成本」。

暴力文化誤導青年

現在社會上有一種很偏頗的思維，以為是打着所謂「人權」、「自由」的旗號就可以為所欲為，違法行為視作家常便飯，衝擊警方襲擊官員視作理所當然，而犯事者更絲毫不以為恥，繼續大言不慚的說是爭取公義。這種偏頗思維在社民連、「人民力量」以至公民黨不斷灌輸之下，令不少入世未深的青年人深受影響，成為激進派衝鋒直撞的棋子。在示威途中，動輒衝入車水馬龍的車道，癱瘓交通；動輒糾眾包圍立法會及政府部門，令政府機構難以運作；動輒粗言穢語辱罵官員及異議人士，甚至襲擊官員。這些行為已經超出了表達意見的界線，是徹頭徹尾的搗亂社會秩序，侵害他人身體，不管有多麼漂亮的言辭包裝，違法行為就是違法的，執法部門都要嚴肅追究，不要令香港變成無法無天之地。

歸根究底，這股暴力歪風正是由激進派煽動出來，為了政治目的不斷在社會上製造衝突，加劇政治對立，鼓勵青年破壞法治，漠視法紀和法治精神，這不僅損害市民的正常生活，而且更在不斷蠶食本港和平理性守法的核心價值。今日黃毓民身為立法會議員可以在議事堂上公然襲警，難以估計他下次會做出哪些行為。社會是時候要想坐視這股歪風蔓延的危害性，是否還要投票給那些禍害香港的政客，而反對派表面不支持、實際縱容推動暴力行為，也要受到社會各界的批評。

暴力示威損害香港核心價值

利和

政府就立法會議員出缺遞補機制諮詢民意，日前在尖東科學館舉行的新一場論壇，因瀰滿而未能進入會場的激進人士，撬門強闖會場，最危險是一名戴V煞面具者手叉保安人員的頸項，這些人再在會場內外搗亂，與會眾推撞，霸佔講台，令論壇一度中斷。

這些激進示威人士，大概覺得言論自由是他們的專利，因此他們可以任意侵犯別人發表意見的權利，他們這樣做是絕對錯誤的。他們不但違反香港尊重不同意見、尊重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，還加上違反和平原則的肢體攻擊和搗毀財物的行動。對於這類粗暴行徑，香港特區政府除了發表對此行為的譴責聲明外，還應展開刑事調查，把犯事者繩之以法，保障其他市民的人身及財物安全。

香港的和平、理性示威文化，正受到這些小部分激進示威者的破壞，他們正在不斷地得寸進尺，由立法會會場內擲物到會場外霸佔馬路，到肢體攻擊和搗毀財物。香港社會因為尊重不同意見表達自由而一直對他們容忍，然而這種容忍不斷被他們濫用，他們不斷

地加劇行動，行為愈來愈難以預測及控制。如今發展成又頸的暴力傷人行為，如果再縱容，其他市民的本人權將受到愈來愈大的損害，令香港的核心價值嚴重受損，令本港蒙上愈來愈大的污點。

這次又頸、與人產生肢體衝突、搗毀會場內物品的人士，對其他人身體構成危險和傷害，這與表達政治立場和意見無關，也與言論自由無關，有關人士不應躲在V煞面具後面當自己是正義的化身，因為他們的暴力傷人行為不被香港市民所接受，是涉嫌犯法的行為。

因此，對於他們這些侵犯別人身體和財物的行為，單是譴責是不夠的，特區政府需要加緊調查，依法辦事，令犯法者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。警方須秉公辦理，不考慮任何人士的政治立場，既不先入為主針對「搞事分子」，亦不因避忌「政治檢控」的帽子而網開一面，因為他們這種亂扣政治帽子的做法掩飾不了他們的暴力傷人行為，絕大部分香港市民不會認同他們。

中國改革兩個亟待釐清和重視的問題

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

上周末欄文章談到，現階段中國的最大問題，依然是政府職能轉型的「不徹底」。正是這一問題，導致了中國的「非典型市場經濟」狀況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經濟、社會矛盾和衝突。

警惕計劃經濟思維死灰復燃

現階段中國的奇特現象是：一方面是經濟形態已勉強披上市場經濟的外衣，而另一方面行政體制從機制到官員的思維和行為模式，都依然帶有嚴重的計劃經濟的烙印或基因。雖然其表現方式已不再是政府直接決定生產規模、產品價格和銷售渠道，但政府卻擁有對經濟項目審批的生殺大權。

問題是：如果是純粹的計劃經濟，那麼經濟活動雖如一潭死水，但畢竟沒有尋租和腐敗的土壤；相反，在經濟一潭死水，人民毫無私利財產和權利的情況下，執政黨的理想色彩和精神氣質反而可以對人民構成吸引力。而「非典型市場經濟」卻既帶有市場經濟的外殼，又帶有計劃經濟遺留的政府職能精髓。

這種情況的必然結果是：一方面，由於政府無法退出市場而滋生了腐敗的土壤和機會；另一方面，當經濟危機或風險發生的時候，傳統的計劃經濟烙印又會十分自然地跑出來，以凱恩斯主義調控或社會市場經濟的名義，實際上帶來的是計劃經濟形態的死灰復燃。

人們只要看一下這幾年的一些現象，就可以明白這一點。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，四萬億投資、基建款項，最後大部分都流向了國有企業；為抑制房價瘋長，各地紛紛出台強制性行政命令，有些甚至直接與戶籍制度掛鉤。

眾所周知，現階段的中國，正面臨工業化二、三十年後必然的城市化進程和難題；為拉動內需，城鎮化建設將是未來中國的重要任務之一，而其關鍵就是徹底取消戶籍制度。但在抑制房價的過程中，人們卻明顯看到了戶籍制度的死灰復燃。一個本身荒唐的問題（如房價飛漲），不等於可以用

另一個同樣荒唐的手段（如行政命令和戶籍制度）去解決。這種做法在本質上與凱恩斯主義或歐洲的社會市場經濟大相逕庭，其背後的原因則是多層面的。

「國進民退」背後的文化基因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中國實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時，許多國有企業和資產被大量賤賣，當時的「民進國退」曾引起人們的憂慮。但這幾年，「國進民退」則同樣引起人們憂慮，甚至是更大的憂慮。

如果說，「民進國退」是市場經濟早期雖不健康，但卻難以迴避的歷程，那麼「國進民退」則折射了從體制到文化的雙重問題。從經濟體制上看，如上所述，中國的政府職能還帶有相當程度的計劃經濟基因，因此「國進民退」對許多政府官員而言似乎天經地義。

從文化角度看，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其實蘊藏着相當多與市場經濟不相匹配的基因。在中國百年現代化的歷程上，「國富民強」、「富國強兵」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真理，但「富」的主體永遠是「國」，而非「民」；市場經濟重視個人權利和契約精神，這一點在中國傳統文化基因中完全沒有基礎；儒家哲學的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」思想，衍生出小家庭永遠服從於國家的觀念，要確立「民富」思想以及私權與公權的博弈，其難度可想而知。

體制的原因加上文化基因，導致中國雖歷經三十多年改革和近二十年的市場經濟，但一有風吹草動，計劃經濟和「國富」的觀念立即死灰復燃。

因此，中國現階段有兩個亟待理清和重視的問題：一、不能將政府職能轉型不徹底而帶來的政府強勢，與成熟市場經濟下的政府干預功能混為一談——若不能解決這個問題，那麼中國可能會沾沾自喜於所謂的「政府干預」或「中國體制模式」，而延誤了中國進一步改革的進程；二、須重視中國改革進程中計劃經濟思維死灰復燃的情況——這一體制上的痼疾，加上中國傳統文化基因中一系列與市場經濟不相匹配的成分，可能將使中國現階段的改革在表面前進的背後，陷入實質上的停滯乃至倒退。

推行國民教育助青少年把握人生路向

留地

「德育及國民教育」的宗旨是「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，致力貢獻社會、國家和世界」，對時下青少年確是一劑良藥，既可使他們博學審慎思明辨篤行，又可給他們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，不至惘然若失。

近數月以來靜心聽到和讀到不少有關《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》的意見和看法。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只因戰亂曾離開過小島幾年，戰後重回接受初中及高中教育。全程是在政府辦（即官立）的英中程度。課程只有一門公民（Civics），沒有正式的「國民教育」課，但是校門內外到處都是米字旗，課室、禮堂處處是英女皇像，英籍校長和教師趾高氣揚，典禮嘉賓往往是英籍高官甚至是港督伉儷；唱的是《天佑女皇》，讀的是專為殖民地學生編寫的課本。中學畢業了，成績和家庭經濟許可的便升入港大，要趕着出身工作的便去打洋行工或者投考「幫辦」；成績較差僅合格的便去做公務員，月薪275元，也算是「一門鐵飯碗差事」。在這種環境氛圍下，其耳聞目染潛移默化，大多是安安分分地做個守法和用功的學生；好在那時社會不良分子還未大舉侵入學校，中國人傳統美德在學校中還存着一定影響，因此，青年學子多數抱着「不怕生兒息且魯，無災無難到公卿」的想法，只求平平穩穩讀完那幾年，能夠踏進港大唸書當然是上上籤，不然，入政府做公務員也不差。學校裡的課程內容和活動無不以英國馬首是瞻，教育的目的亦是希望培養青年人做殖民統治的順民。

幫助青年人淨化心靈除舊納新

青年人的心靈像一扇剛打開的窗，無論是薰風或烈風，無論是陽春白雪或下里巴人之音都可以飄進去，當然有入者有認和選擇的能力，但是也有些是不辨香花毒草，尤其是往往會先入為主，入了鮑魚之肆卻還沾沾自喜。德育和國民教育不單止要由學校傳授解惑，整個社會的風氣和道德水平也對青少年有着重要影響。不過，由於學校是青少年主要受教育的

地方，責任應由學校負責，要具體地設立有關的課程和活動。上年紀五十年代香港處於一個很獨特的環境，本身還在筆路藍縷地進行着戰後恢復，百廢待興，民生艱難，另一面北望神州正進行着熱火朝天的新中國建設。青年人感觸到殖民地和祖國兩地現實的差異和前途的不同，他們那打開了的靈魂之窗就會試圖吸收新的空氣和音響。容許我以個人的實例來解說一下：那時在那皇家序序正穩當地朝着港大進發本來對前路不必講課，但不滿足於現實和追求至善是青年人的特點，打開了的心窗接觸到愛國學校的年青人的聲音；讀到了《文匯報》黎於群等作者的《新晚報》那輕鬆引人入勝的雜文小品；記得我還參加過《大家談》的「捉雞」，拿了十元八塊稿費與高采烈地往「三聯」買書。就這樣，自我地接受了這些無形的「國民教育」，其中內容就是能更好更全面的認識祖國。萌芽的思想經過並非朝夕可就的充實和提高，終於我和幾位同學放棄了香港大學的獎學金回到祖國大陸升學。由於每年這最負盛名的百年老店都有幾名「叛徒」出走，英籍校長當然盛怒，華籍副校長就把我的獎學金也吊銷了。

所以說，德育和國民教育不能只是空談，而必須實事求是地讓年青人有所接觸有所體會，要讓他們心靈自由吐納除舊更新。這不是洗腦而是心靈的淨化歸真。

關注國家發展 明確人生方向

無論是半世紀前或者是現在，認識祖國的下一步並不一定要到祖國讀書或服務。當然今時不同往日，年青人認識了祖國而投身到那大家庭大環境，其道路較我們那時寬暢得多。李克強副總理早些時在港大百年校慶的講話中鼓勵青年學生要「關注和了解祖國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」，這點確是十分重要。不要僅看現在，要看過去；不僅要橫向比較，還要縱向比較我國過去的底子。再請容許我談談個人經歷：由於考慮到我們是以農為主的大國，農產一貫不足供國人溫飽，所以我決定回國讀農。甫進校門不久便開始了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，整個反右三面紅旗教育改革山下下鄉，然後是惡名昭著的文革，走過這段坎坷崎嶇的路並不容易，在淒風苦雨中我揣在懷中的一掬春泥化作一方自留地，在它上面孕育着幾株支持活命的稻粱和一簇注向靈台的神矢，它們使我堅定地相信祖國，無論從珠江三角洲的稻田走向海南五指山麓的楓樹林，從維多利亞港遠航泰晤士河畔都沒有失去方向。

幾天前在報上讀到一篇中六學生的文章，他有感當代青年人的表現，引用《孟子》的「四端」。他說：現在青年有「智」，但是缺少了「禮」和「義」。「四端」出自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，原文是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」這位年青學生難得有這些看法，我讀了很高興和欣賞。不過，他評論道：「大學生缺乏的正是『禮』、『義』。以為恃『智』而狂妄自大，輕視規則、法治……」愚意以為如果以孟子所指的「智」似乎並非等同於「智識」，而是能分辨是非的明智智慧，這樣看來，有些年青學子自以為具「智」是否也高估了自己？

可見，德育和國民教育對時下青少年確是一劑良藥，既可使他們博學審慎思明辨篤行，又可給他們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，不至惘然若失。今天《文匯報》剛報道了本港有37%初中生抑鬱，他們也許正是因為惶惑而找不到前進的路標和指引。

「德育及國民教育」的宗旨是「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，致力貢獻社會、國家和世界」，這個大原則怎樣說也不能反對，而在進行這教育時無可避免地要認識和認同祖國，因此，只有企圖疏離和隔絕青年與祖國的血肉關係的人才會發出反對聲音。其中有人或以課程負擔重、不夠課時安排或缺乏師資等等原因作擋箭牌。其實，這些都可以通過課程的組合精簡、師資和教材的培訓組織等方法解決。當然，師資不能濫竽充數，教授「德育及國民教育」的老師首先要具有良好的德行和對祖國有正確的認識。

限於水平，對此教育大問題我應不能置喙，但此事有關青少年和香港前途，所以本着「位卑未敢忘憂國」之旨，謹表寸見。